

苏区时期党校教些什么

□ 杨会清

我们党创办党校的目的在于培养和造就各级领导骨干，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以适应革命、建设和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党校的课程设置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早在安源党校创办之初，其主要课程就包括：政治经济浅说（即瞿秋白、王伊维所译的《政治常识》），俄共党史、少运史。这里就涵盖了马列主义理论和相关的政治常识。之后，党的六大决议又进一步明确：党员教育要侧重于“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的经验”。这也就决定了政治理论和实践能力成为苏区党校教学的主要内容。

突出理论教育的首要地位

1933年在中央苏区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校，虽然当时各个班次的课程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了理论教育的首要地位。当然，苏区时期还没有要开展理论教育或党性教育的说法，而是统称之为“政治常识”教育。根据学员谭启龙、刘俊秀、肖锋等人的回忆，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政治常识”教育，主要包括三大类课程，即马列主义理论类、党的历史类和苏维埃运动史类。在这三大类课程中，马列主义理论类的课程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学员李坚真后来曾回忆，“我是高级训练班第二期学员，……党校的课程一半是马列主义理论课。”具体来说，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包括了凯丰（何克全）讲授的《列宁主义问题》，董必武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成仿吾讲授的《辩证唯物史》，等等。另外，还专门印发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原著，供学员自学。在省级党校，课程设置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一要求。学员徐大妹后来回忆，她在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学习期间，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就包括了方志敏、柳真吾（省苏裁判部长）、汪金祥（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讲授的《阶级斗争》和涂振农讲授的《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史》。

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广大学员提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如马克思主义学校主席团在第一期典礼上的致辞中所指出的：虽然苏区干部训练班只有两个多月的学习时间，但由于中央局、中央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同学们的学习热忱，他们已经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相信并希望他们能把这些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领导千百万工农劳动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

侧重对实际工作能力的培训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共产党领

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正因为如此，苏区各级党校才会从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将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培训提上议事日程并纳入教学计划。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而言，除罗明、李维汉、邓颖超所讲授的《党的建设》，毛泽东、项英所讲授的《苏维埃建设》，刘少奇、陈云所讲授的《工会工作》以及唐开元所讲授的《劳动法》外，这一方面的课程还包括：《支部工作》《宣传鼓动工作》《群众工作》《经济政策》《白区工作》《青年工作》《婚姻法》以及《土地法》，等等。上述课程，在省级党校同样要开设。像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万永诚即为学员讲授了《白区工作》，而时任少共省委书记的关英则为学员讲授了《青年工作》。在苏区时期，这类教育统称为“实际工作常识”教育，也相当于我们今天各级党校所进行的专业能力培训。

除课堂讲授外，苏区各级党校还必须根据教学进度，同时结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与任务，组织学员深入基层帮助开展各项工作，以使学员在实践中提升工作能力。如扩大红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深入，党校的学员也必须参加扩红工作。像李坚真等人，“就被派到福建省长汀县去扩大红军”并圆满完成任务。而肖锋等人，则被派到瑞金下肖区“协助下肖区少共区委做红五月扩红工作”，为全区顺利完成扩红任务作出了贡献。又如社会调查，马克思主义学校高级班当时曾分成3个组，分别到会昌县招财区、筠门岭和县直机关开展社会调查。其中有一组学员，深入到独立营、政府机关、群众团体或群众家里，进一步了解情况，摸清各种人的经济情况、政治倾向。在这期间，他们学习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协助区会查出了隐瞒成份、偷富暗田、营私舞弊和地富破坏活动的线索。通过外出实习，不仅帮助了边区对敌斗争，也锻炼了学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再如做群众工作，学员平时甚至课间休息时，都必须下田同当地老表们一道犁地、担粪、插秧，他们同群众一样，卷起袖子，挽起裤腿，打起赤脚，个个都是劳动能手。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周边群众建立起浓厚的感情。肖锋后来回忆，“今天来明天去的老表们，和我们非常亲热，一点也不感到生疏。有事就叫我们去干，有东西就拉我们一块吃。我们建立了浓厚的感情。”

此外，苏区党校的教学计划中还安排了其他的工作，包括：有计划参加农村的支部活动；积极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利用礼拜六和假日实行义务劳动，帮助红属挑水、砍柴、送肥、浇菜，等等。而这些，也是党校学习的一部分。

强化军事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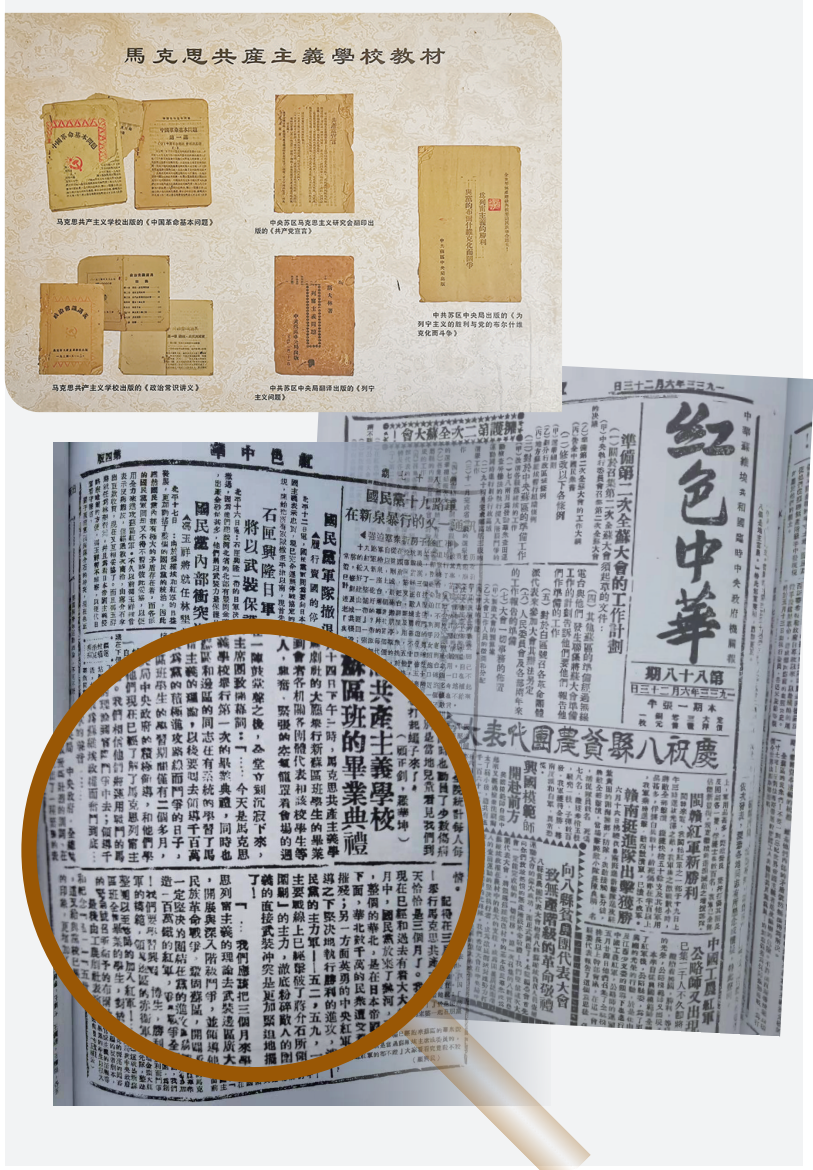
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中央政府提出了“工农群众军事化”和“军事行动系统化与集中化”的要求。对党校学员来说，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自入校之后，学员们就必须承担起政治学习和军事学习这双重任务，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

从实际情况看，苏区党校开展军事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开设军事课程。这包括：《战术》《军事政治工作》《游击战争》《军制学》以及《地形》，等等。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就曾听过朱德讲授《游击战争》、博古讲授《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实际上，项英、李德也曾在党校讲过军事课程。二是强化军事训练。入校之后，学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规范的军事训练，包括每天做军事操、跑步、唱歌，等等。谭启龙后来回忆：我们在学校，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大家都积极参加军事训练，每天早上出操，学员们统一服装，有枪的拿枪，没枪的拿梭镖，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经过一个时期不间断地学习，大家受到了一次严

格的军事纪律教育。此外，学员还经常开展“射击训练”“打靶训练”，甚至还要“学习用机关枪打敌人飞机”，以防止敌人飞机轰炸。当然，军事学习的成果也必须定期检验。对于军事课程的考试，学员王泉媛特别自豪。她后来曾回忆，“5个半月后，毕业考试。军事课我考了第一。那是夜晚演习。红军大学扮白军，我们党校扮红军。过河、摔跤、追击、爬山，我样样跑在前面。”三是参加军事实战。据肖锋回忆，1933年7月初，马克思主义学校高级班曾停课一个月，学员的任务就是到粤赣省会昌筠门岭实习，协助边区前线的工作。而肖锋这一组，则跟着独立营一起行动，去攻打武平大明圩的靖卫团，结果，“激战半小时，俘敌24人，缴枪15支。”

苏区时期，各级党校从党的方针政策、中心任务和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合理地设置党校课程，从而培养出一大批适应当时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合格的党员干部队伍。

党校红色记忆



84年前的1935年，当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千难万险脱离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征服雪山草地，抵达陕北肤施这个当时偏僻的、远离统治中心的西北小城时，中国革命遇到了一个“老”问题——中国革命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这是个中国共产党人已为之在黑暗中艰难摸索了十多年，还没有找到答案的“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历经血与火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对中国革命展开了新的思考。

回顾历史，穿透岁月和时光，我们依稀看见，在凤凰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昏暗煤油灯映照着的，毛泽东那穿着土布衣服的伟岸身影。多少个彻夜不眠，凝结着对中国革命最深刻、最透彻的思考，《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篇篇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伟大篇章诞生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共产党人获得了坚持真理的勇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共产党人在思想与理论上获得了升华，中国共产党从此涅槃重生，信仰的力量让革命的火种从此燎原中华！

革命的艰难打不倒一个为中国革命而奋斗，一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党；生活的困苦也难不倒一个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人民作为立党之本，有着鱼水般党群、军民关系的党。在这个被称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里，只见公仆不见官。陈嘉庚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黄炎培在这里改变了对“历史周期律”的迷茫。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种地、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使荒地变成了粮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就是我们党在缺衣少粮的严峻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面对今天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延安时期那样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增强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我们年轻干部更要像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那样，人在事上磨，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长才干。要坚持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要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浩然正气。

2009年11月13日，习近平在延安干部学院视察工作时强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伟大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延安精神，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是我们做好各项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延安精神，光照千秋！

□ 严广超

延安精神 光照千秋



明鉴台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中“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和“自我完善”等人才教育理念，对今天的干部培养和成长都具有积极意义。

以德为先。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强调道德和伦理。儒家经典著作《大学》开篇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周易》里也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认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在古代传统社会，官员的政治标准，首先应是道德上的贤人，然后才是政治上的执政者，即所谓“修身而不及治者

有矣，未有不自己而能及民者”。《左传》中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把官员的道德修养排在了第一位。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正统的知识分子大多希望通过居官从政这一途径来济世益民，把从政实践中为圣为贤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在今天的干部教育培养中，我们仍然要强调“德”的重要性，要把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党员干部成为新时期道德上的楷模，进而来推动全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德才兼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立“德”在先的同时，也突出了“才”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早在尧舜禹时代，我国就有了“选贤，用能”的传统。推举有德之舜继任尧就

是很好的明证。汉代著名儒学大家董仲舒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受教育者“必仁且智”，并说“仁而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他认为，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是根本，但必须德才兼备，二者不可或缺，否则就不完美。孟子强调：“不信仁贤，则国空虚。”韩非亦力主用贤，强调发挥个人的“才能”，其曰：“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曾提出：“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这说明王安石更是注重“选贤任能”，认为选拔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才是治理国家、进行社会改革的头等大事。当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培养干部的“才能”要求更加突出，党员干部只有努力提高治国理政的本领，真正做到“德才兼

备”，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

道德完善。孔子讲“德不孤，必有邻”，张衡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一个崇尚道德、遵守道德的国家，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道德的完善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是一个极其漫长不断自我修炼的过程，需要通过持续的修身、慎独、克己才能达成。修身是道德完善的基本功，它甚至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慎独，指的是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依靠内在的道德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荀子认为慎独是实现至高道德目标的载体，他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慎

独是官员道德践行的重要方法，也是检验官员道德修养成效的标准之一。克己。指的就是要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事实上，克己也是官员进行修身的起点和前提，缺乏个人的自我严格要求，修身也就无从谈起。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历来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推崇，这份求学做人的追求值得后世千古传诵。相对于古人，作为当今社会建设的领导者和实践者，党员干部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做一个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理想信念坚定，努力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 黄 峰

古代人才教育观中的“德”